



中国好姐夫

◎刘白



咏梅是我们大家的姐姐。之所以称咏梅为姐姐,只因为她是我们的同班同学,年龄比我们稍长,个子在一众女生中鹤立鸡群,又有侠肝义胆,我们一干同学,不管男同学还是女同学,都喊咏梅为姐姐。姐姐在班上是暖心大棉袄,谁心里有小委屈,谁对谁有点小意思,谁又被家长骂了,谁学习又有掉队的迹象了,这些连班主任老师都不易觉察的地方,咏梅姐姐都能及时发现,并给予安慰和开导,因此她这个大姐不是谁封的,而是在长期的学习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

有点小小的遗憾是,毕业后姐姐远嫁到徐州,在那个年代没有电脑没有手机更没有微信,只能从她爸妈那里得到一点信息。当年姐姐关心我们,如今我们这些同学关心远嫁的姐姐。

后来有出差去徐州的同学,都要肩负一项重要使命,那就是了解姐姐的情况,最好能与姐姐见个面。听去过徐州的同学回来说,姐夫真是好姐夫。姐夫是个记者,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书法也好,我曾向姐夫索要过墨宝,他总说还要练习。他不仅对姐姐好、对女儿好,而且对岳父岳母好得不得了。同样,对去看望姐姐的同学也热情得不得了,一个姓吴的同学回来说,姐夫自己的酒量并不大,但总想方设法把气氛营造得很好。

前年5月,我有机会到徐州,想着要不要惊动姐姐姐夫,正踌躇间,姐夫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你是不是来到徐州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你微信上一个小小的动静我都掌握的,你不要忘了,我是个记者。我只好如实回答,是到了徐州,但只有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要离开徐州去下一站,因为时间紧,所以没有惊动姐姐姐夫。姐夫大声说,就今天晚上,我和你姐来见你一下,你发个定位来。我把定位发过去,导航一看,距离他们居住的地方还有50多公里,一个在城东、一个在城西。

我等啊等啊,等了好久,才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我的好姐夫长鸣兄拄着一双拐棍,在门口与我打招呼。他说,弟弟,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他接着说,一次上班路上,摔了一跤,腿摔坏了、骨折了,医生让不要轻易走动,更不能开车。你姐刚拿到驾照,来的路上,她又不敢开快,且有一段路在翻修,所以来迟了。我说,既然如此,何苦来回奔波。姐姐说,长鸣听说你来了,开心得不得了,本还想让女儿女婿带上孩子一起来看看你的,小家伙已经睡着了,就来不了了。

在我感慨万分时,他们已把我拉上车,到附近找了个酒馆,陪我聊天。我说,姐夫你不要喝酒也不能喝酒。长鸣兄说,你来了,我怎能不陪你喝点酒。我说,姐姐你劝劝姐夫,可不能让他喝酒。咏梅姐姐说,我看谁也劝不了他。他这么开心,你就随他陪你喝点吧。我说,那姐夫随意,我今天喝酒自己自觉,不要你劝,也不要你陪。

那天,我喝了不少酒,开心得很,姐夫也开心得很。估计他们回到家时已过了凌晨2点。回来后,我把我在徐州的经历告诉同学,同学们一点也不觉得惊讶。他们说,你到了徐州让姐夫知道了,他们肯定会这样的啊。我说,长鸣兄真是个中国好姐夫。同学们也点点头说,嗯嗯,中国好姐夫。

我和丹先生在接受再教育的岁月里

◎王广祥

上周日,我接到原插队的生产队老队长盛情邀请,返回第二故乡海安市大公乡马舍村13组省亲。

见到老知青归来,乡亲们纷纷围上来嘘寒问暖,问得最多的就是过得可好,年纪最大的丹先生是否还在人世,他的两个儿子现状如何。

啊,丹先生,我当年的忘年交,一个满腹才华的南通老人,过世已经21个年头了。乡亲们仍如此惦念他,不由勾起我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和他老人家患难与共的一个个难忘的回忆。

我当年所在的生产队地处海安里下河水乡,是一个三面环水,与三个公社交界,只有一条旱路通往外界的贫困村庄。1968年12月,我来到这个生产队时还是一个15岁少年,同行的13个男女插友大的16岁,小的和我差不多。当时,我天真地认为下乡天天可以钓钓鱼打打球,再也没有人束缚我,哪知日后生活的艰难呢。

那年月,里下河农村生产力的低下使农民兄弟都采用原始方式,从事高强度劳作。我每天迎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即使糠菜半年粮,仍不能果腹。渐渐地,知青们失去了希望,天天都盼望能早日回城。

我下乡第二年,生产队突然来了一位南通城里的50多岁的老先生,名叫李丹。其时的丹先生穿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对着大伙直点头,除了我,谁也听不懂他打招呼的南通风味普通话。队长宣布,从今往后他就和你们知青一起上工,你们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思想上要和他划清界限,他是头上有帽子的人,云云。

南通话一下子拉近了距离,我才不管什么帽子不帽子,对着丹先生连连问候。还天真地问他,你老人家这么大年纪怎么也下来当知青?未及老先生开口,队长狠狠瞪了我一眼,你个细伢儿少问这些东西,还不早点去做活计。

没过几天,丹先生的两个儿子也到了生产队,一个算是我插队的同伴,一个年纪尚小,算待业人员,同来的还有丹先生的夫人,原是通医附院的一名老护士,被下放到我生产队邻近的麻风病医院,全家算在这里扎下根了。

当时,我年少体弱矮小,算三等劳力,每天6分工,干一天折合三四角钱,丹先生和我一个档次,接触多了起来。丹先生待人十分和气,见人就点头,没人的时候才和我说说南通话,我几次问起他为何下放到这里受大害,到底为什么戴帽子。丹先生不是借故扯开就是轻声对我说以后再讲,一次次对话似乎都是个谜。时间一天天过去,丹先生住上了生产队为他盖的简易半瓦房。与我们知青住的牛棚比,他家的条件算有所改变了,到了晚上我无事可做就常往他家跑。慢慢地,我知道了丹先生原是南通市税务局的国家干部,因年轻时学得一口娴熟日语,在日据南通时代被迫当了几天翻译惹上大祸,20世纪50年代中期突然被戴上帽子下放到街道企业。“文革”兴起,又首当其冲被送到里下河农村接受教育。

在丹先生面前,我们这些初中文化的知青几乎就是文盲,我常悄悄请教丹先生南通城的过往和旧时南通人的生活。丹先生娓娓道来,对南通城的人文历史如数家珍,特别是南通大街小巷的名号和历史名人过往,我听得如痴如醉,至今铭记在心。

在贫穷的乡村,我们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城里娃根本不会算计着过日子,每个月份的二三十斤稻谷打成米,半个月不到就揭不开锅,常饿得路都走不动。我走投无路,有时就借故到丹先生家蹭饭。其实,丹先生家也常是无米之炊,好在他的夫人在麻风病医院工作,有固定工资,可到医院食堂买些馒头回来度日。丹先生见我可怜,有时给我一个,这可是白面馒头啊!我吃一个,丹先生家就少一个。

阶级斗争年代,每逢有什么指示下发,生产队照例要热闹一番,贫下中农全被叫到大场上三呼万岁万万岁,健康健康永远健康,而队里七八个戴帽的也必须挂上牌子站在第一排向某人请罪。看到丹先生羸弱的身子在口号声中颤抖,我不禁怜悯,想起了下乡前突遭反派污为叛徒汉奸而揪斗的父亲,他是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革命的干部,还被关在学习班上惨遭折磨。这一幕多像自己的慈父在遭罪啊!可我哪有能力左右这一切呢?只能躲在栖身的牛棚里默默流泪。

岁月
流金

陈顺源

岁月流逝五十多载,我行走世界的脚步也已达五大洲53个国家,每每行走在异国他乡的路上,每每因语言不通陷入困境,我总后悔当年没听取丹先生的教诲。记得一个秋天的雨夜,丹先生吸着旱烟很认真地对我说:你天天这样下去总不是个事,你是个比较聪明的南通伢儿,我想偷偷教你学日语,你要看到国家已经在起变化,学门外语将来一定会派大用场的。那年月,无数知识分子被打入冷宫,那么多权威专家、教授都成了反革命,何况我那时的文化知识连小学水平都不如,学外语有何用呢?愚昧无知的我没有听丹先生的话,至今悔恨不已。

插队五年后,我招工去了南通煤矿,而丹先生和一帮插兄还在苦海里挣扎。次年,我回南通探亲,特地回到生产队看望大家,为了给丹先生留下一个念想,我请他在栖身的小屋前拍张照片,丹先生特地换上平时舍不得穿的中山装,十分庄重地站在小屋前,留下特殊年代的画面。不久,丹先生收到我寄来的照片后,一直视为珍宝,在上面写上年月日,离世前还关照小儿子永远保存好当年小王拍的这张珍贵的好照片。

80年代的春天来到了里下河水乡,丹先生和无数个在那个年代受到不公正处理的知识分子被脱去了头上的帽子,成了堂堂正正的公民,户口也迁回家乡南通,享受退休金。记得1981年9月的某一天,我从友人处得知丹先生被聘为海安县工人业余学校的日语老师,次日就正式开课。我匆匆赶到海安,开课铃响,一位身着白色西服、打着鲜红领带的老人健步走进课堂,他向挤得满满的求知学子微笑着弯了弯腰介绍道:我是南通的李丹,30年代在南通求学时曾学过日语,从现在开始,我将平生所学与各位分享,希望大家认真听课,学好这门课程,为祖国的“四化”作出贡献。目睹这一场景,我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丹先生,您的所学在80年代第一春终于派上了用场,您迎来的不仅是自己的第二春,更是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翻天覆地的第二春,我作为您同甘共苦的忘年交,真为您赶上了这个好时代感到自豪!